



方言话剧卷土重来，缘何？

◆ 王纪人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舞台上演过方言话剧的，如1950年就演出根据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改编的同名方言话剧，由大牌导演应云卫执导，大牌舞美韩尚义设计。上海不仅演过方言话剧，还存在方言话剧团，这可能在也是没有之一。上海方言话剧团当时归属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并有独立的建制。《啼笑因缘》用的是沪语，在1957年被吉林市话剧团搬演，不知道用的是普通话还是东北话。沪语方言剧的保留剧目一直受到本地观众热情欢迎，如1962年7月7日在卡尔登大戏院（现长江剧场）再度演出的《啼笑因缘》，竟然创下了连演100场的纪录。在那100天里，卡尔登所在的黄浦路，晚上差不多可以用“集腋成裘、挥汗成雨”来形容了。遗憾的是，后来上海方言剧团忽然不存在了。但《啼笑因缘》并未绝响，2017年6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有个长江剧团在演出，剧场是“城市俯瞰式”，舞台是一堂多景。

自2016年以来，方言话剧在多个省市的舞台上卷土重来，乃至巡演全国，势头不小。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忠实的获奖作品《白鹿原》曾被北京人艺改成同名话剧。2016年，陕西人艺对北京人艺版作了调整，台词全用陕西话。陕西话是西北方言的次方言，如干大（干爹）、撩骚（勾引）、麻烦（麻烦）等。不仅如此，由于故事发生地多半在白鹿原，该剧还用了白鹿村的次方言。除了陕西方言和关中俚语的台词外，祠堂、窑洞、麦场、青砖瓦房的舞美设计，歌队不时唱响的秦腔，无不在体现关中文化的地域元素，同时体现出史诗式的时代变迁。陕西人艺版的《白鹿原》，曾到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过。

2017年，陕西人艺再接再厉，把陕西另一位茅盾文学奖得主路遥的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改编成方言话剧。重庆话剧团的重庆方言话剧《河街茶馆》，以抗战时期的重庆大轰炸为背景，表现了底层民众的国仇家恨、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老街》用河南方言演出，由于表现曲艺人在国家危难之际的民族大义和文化担当，大量加入了河南坠子、河洛大鼓、大调曲、三弦等，使河南的民间曲艺在话剧舞台上交相辉映。四川人艺把老舍的京味《茶馆》改成川味茶馆，剧本忠于老舍原作，但台词也改成了九成九的重庆、成都方言，在舞美设计和舞台调度上颇多创意。此剧已作全国巡演，今年还参加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的获奖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由从事实验戏剧的导演牟森操刀，改编成同名方言话剧，用河南话演出。2018年上演的另一部方言话剧也是根据茅盾文学奖得主的获奖作品改编的，那就是金宇澄的沪语小说《繁花》。该小说是多个文艺样式的IP改编热门，已改编成长篇评弹。方言话剧《繁花》（第一季）全沪语，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出品，“跨界班底，青春阵容”，演绎了上海腔调、世事乾坤。

以上列举的还不是近几年来各地方言话剧创作和演出的全部。但即使从这不很完全的回顾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方言话剧卷土重来之势和崛起的端倪。首先，它们多半改编自经典（如老舍的话剧《茶馆》）和当代小说名著，茅盾文学奖是重要的IP。其次，它们改编的原作，都有极其浓厚的地域色彩，而且都是用地方语言写作的，为改编成方言话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即使如《茶馆》原作的台词也是京腔十足，充满了地域特色，成为改编成川腔的一个借鉴和动力。第三，方言话剧作为话剧和曲艺的混生剧种，为话剧向中国民间戏曲的借鉴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渠道，从而使话剧这一从外部植入的舶来剧种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最后，方言话剧的重新勃兴，意味着各地域对自身的文化自信，和在中华文化共同体中作出文化表达和参与的要求。从以上部分剧目在全国巡演获得的理解、共鸣和欢迎程度来看，方言话剧决不是不可理解和沟通的，它完全可以与普通话剧并存。毕竟，现在话剧面对的是见多识广的观众，他们多半去过不少省份，听过不少外省话，还遍尝不同的菜系。即使是宅男宅女，他们也认识舞台两边标出的台词字幕吧。字不同音却同文，现在的观众是识文断字的，这也是方言剧得以兴盛的一个文化原因。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年度大展必须有的关键词

“看穿”现象级四大博物馆展

◆ 王琪森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际，上海博物馆的董其昌艺术大展、辽宁博物馆的王羲之欧阳询书法展、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特展、台北故宫的宋人花鸟画展齐聚，可謂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以超豪华的阵容，国宝级的展品，显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辉煌璀璨。历代的大师巨擘们，通过当代博物馆这个平台，穿越时空，雅兴联谊，丹青流芳，翰墨留香，具有现象级的启迪意义及文化建树价值，对全面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有积极推动的作用。

高端的艺术引领性

上博、辽博、台北故宫及日本东京国博，都是高大上的一流博物馆，在同一时段一起推出四个大型艺术品收藏展，应当讲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博物馆意识的共同彰显及博物馆职能的高迈取向。在这四个展览中，上博的董其昌艺术大展无疑是目前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因而引起了海内外的万众瞩目。本次大展在展览规模、展品规格上不仅创董其昌在海内外历次展览之最，同时在图式谱系、创作文本、历代文献、相关资料、史脉艺绪等方面都作了系统的呈现，与理论研究、学术探

讨、艺术评论、文化分析、史学梳理等实现了多元组合，对博物馆的本体功能与专业职能具有重要的开拓作用及示范效应，让受众真正享受到了一次审美的饕餮大餐，也让专业人士真正领略到了一次深度的艺术巡礼。唯其如此，可以讲在国内外的“董学”研究及“董展”系列中，具有集大成式的效应及里程碑的意义。

独特的文化构建性

如美国文化学家泰勒所言：“文化”是一种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及习性。”因此，本次海内外四大博物馆所举办的四个艺术展，无论是在展览的创意与宗旨、形态与内容、意义与取向、延伸与辐射、开拓与研讨等方面，都达到了独特的文化构建性。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于1月16日至2月24日举办《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将珍藏的颜真卿《祭侄文稿》出借扶桑。颜真卿是大唐书法杰出的代表，他的行书《祭侄文稿》被尊为“天下第二行书”。历史地看，日本书道最初源于中国，有“日

本王羲之”之称的空海和尚，曾来大唐长安取经，直接书学王羲之、颜真卿。他的书法成名作《灌顶历名》，其运笔、结构就胎息《祭侄文稿》。因此，这次展览是日本书道的寻根溯源，也是笔墨精神与书学传承的一次独特的文化构建。

积极的学术使命性

博物馆除了具有历史传承、文化传播、审美传输、艺术传导、知识传递等功能外，还需要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及积极的学术使命，这是相当重要的博物馆“内功”建设及“软实力”体现。正如文化学家韦伯所说：“文化事实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如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月1日推出的《宋人花鸟画展》，展出宋人花鸟写生册页和手卷达二十多件。台北故宫在翎毛题材的收藏研究上实力雄厚，本次展览以“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为最耀眼的华彩乐章。然而，其更重要、更关键的是与之相应的学术使命：即历来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画没有写实传统或是写真能力，因而不如西洋画。本次展览突出了宋画的写实性，如宋徽宗的花鸟就是来源于写真。除了展示图式外，还搭配禽鸟的实拍照片一并陈列，让受众可以进行绘画与照片的对比，同时亦从理论上证明了宋画的这种“格物致知”论有关，完成了从艺术展览与学术使命的相互对接和互为作用，使展览得到了艺术性的升华、理论性的建树及史学性的实证。

清风扑面《画》中来

◆ 张锡荣



近日看了杨浦出品、上海淮剧团新创的淮剧《画的画》，让人耳目一新，好像有一股清风从《画》中扑面而来。这出戏在80分钟里，讲述演绎如此情节复杂的故事，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活的人物，揭示了如此深刻的主题，实在难能可贵。这将会对全国的戏剧舞台带来较大的冲击和挑战。

这出戏的成功首先在于编剧。作为编剧的管燕草对生活有思考，胸中有章法，笔下有文采。从文本上

看，它既有文学功底，又有文字功力。讲故事有条有理，写人物栩栩如生，编唱词自然流畅，唱词中还不乏精辟警句、喻世名言，比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唯才是举是根基”等，敲击人们的灵魂。

本剧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此剧是一出带有寓言性质的讽刺喜剧。导演手法很现代，舞台呈现也很时尚，讽刺了一个官迷陈海山，他以画骗官，又找画买官。他先用一幅假画骗取了个县令，还不满足，又要找

名画《逐鹿中原》，以献媚皇上，换取更大的官位和权势。此剧的“画”，可謂是“官位”“权势”的代名词。一台人物围绕着《逐鹿中原》这幅古画，各展神态，活灵活现。陈海山的利令智昏，兄嫂陈海峰、刘文莺的正派本分，李进财的善良平和，张公公的奸诈，可谓相映生辉。当哥哥陈海峰看清了陈海山的一心向上爬，不择手段、不顾廉耻的丑恶嘴脸后，不禁后悔长叹：“二十年梦一场，一片心血付汪洋……我当的什么兄长，教的什么文章！”实在令人痛心也发人深思。

本剧的演出样式和舞台呈现，彰显了这个年轻团队的创新和探索精神。大胆创新，是海派文化的精髓。《画的画》的创作者们力求用这种虚拟灵活的小剧场演出形式，争取和培养年轻观众。这种探索是有益的，有效的，也是大有前途的。

《画的画》在河南参加第八届黄河戏剧节，取得了很可喜的成绩。这是一台用心、用情、用功排演出的好戏，好听、好看、好玩。有创意、很新颖。场景转换很灵活，这也体现了戏曲的虚拟性。唱腔也是地道淮剧韵味儿。台词也很接地气，有些词的现挂，比如“下岗”“坐飞机”“喝晕”等都很有剧场效果。

愿创新精神永旺盛，愿探索创新的戏路越走越宽，愿更多的青年观众走进剧场欣赏更多如《画的画》一般别开生面的戏曲作品。